

上 篇
历史与现实

第一章 近代历史上的政党政治述要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些轰动事物可以喧嚣一时，但最后却在岁月流逝的研磨中湮没。相反，另一些当时曾在逆境的缝隙中苦苦挣扎的新生事物，到头来终于由涓涓溪流发展为恣肆汪洋的阔大气象，并影响到其后久远的时代。日本近代政治历史上政党产生并在艰难、曲折发展中走过的历程，就是这样一种起自细微但影响深远的政治沿革过程。

第一节 政党产生是近代政治历史的里程碑

政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政治结构进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政治机理上讲，资产阶级革命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体制下的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要求代表某一阶级或阶层、集团的政治组织为维护其利益而斗争。日本近代历史上政党政治的产生、发展，就是阶级斗争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后政治斗争的必然产物和工具。

一 “党”的观念变化与政党发端

政党产生在日本政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尽管皇权下的政党政治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较之至高无上的封建权力，近代政党政治毕竟是一种进步，标志着近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开始。曾几何时，政党政治在大量存在封建文化残余的明治社会里站稳了脚跟，其影响逐渐投射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

至在语言学意义上对“党”的理解也发生了质的转变。

众所周知，六七世纪的日本曾通过学习、吸收隋唐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直至近代以前，日本长期处在中华文明的浸润下，其道德标准、价值判断，乃至对政治事务的理解无不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在古代，以中国内地为核心的汉字文化圈里，“党”无疑是一个贬义词。按照中国古代先贤的区分，大千世界中的芸芸众生可以依照道德高下区别为“君子”和“小人”两大类。一个简单的公式是：君子重于义，而小人则重于利。与儒家推崇的仁、义、礼、智、信等君子风范相比，为利益驱使的小人聚合起来便是“党朋为奸”、“结党营私”，这无疑是一种为君子不耻的龌龊行径。所以，包括日本在内的古代东亚各国里，绝无自称为“党”的人群，相应于政治集团的组织或集结通常是叫做某某“社”或某某“会”。

日本明治维新后，为了尽快吸纳西洋近代文明中的国家制度与政法体制，维新派知识分子开始大量翻译洋文书籍。为了体现新意，他们根据自己的体会，突破原有语意的藩篱，把“citizen”、“parliament”、“party”，翻译做“党”。于是，明治中期便出现了“自由党”、“立宪党”等早期政党名称。不过，早期的政党中率先使用“党”的称谓也大多限于民众方面，政府方面为对抗民权派而组建政党时，创立的政治组织仍然叫做“会”。例如，政府御用的大成会、国民协会等都是到了山县有朋改组内阁时才使用起“帝国党”的叫法。而伊藤博文四处奔走建立政友会时还特别强调：“改变以往的以党为名，此次断然取名为立宪政友会，把中央组织改变为俱乐部，各地也设支部性的俱乐部……废除以党为名，不外乎是避免遭官界或实业界的厌恶，使人们易于加入的一种手段。”^①可见，当时至少在上层社会对“党”的认可程度还是十分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42 页。

有限的。早期以政党形式参与政治的活动，不仅在日本国内属于民间草莽人士的一种“创新”，而且因其同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甚至会遭到一些耻笑。据史料记载，1877—1882年任大清国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还曾撰文讥笑那些推崇“和魂洋才”的日本近代学者和政客，竟然搞出了自称为“党”的组织。但黄公笑声未了，中国也很快出现了自称为“党”的组织。足见亚洲在走向近代化道路上，“党”是一种势不可当的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无独有偶，在西方政治概念中“党派”（Party）、“政党”（Political Party）等近代政治学概念也同“宗派”（Faction）有着某种先天的联系。曾带领着百科全书学派开拓了一个时代的伏尔泰为了廓清近代政党与历史上宗派之间的界限，还曾特地指出：“党派这个词本身并不惹人讨厌，而宗派总是让人有这种感觉。”后来，伴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深入发展，日本大众观念里的宗派缓慢曲折地过渡到党派，“政党”终于走出了“宗派”的阴影。后来，随着历史发展脚步的加快，近代政治中的“结党”已经不再带有“营私”的贬义，“党”的概念在亚洲各国逐步得到了普遍认可。

二 不同历史时期的政党的价值评判

回溯日本近代历史上早期政党的“草莽特色”，并非是在贬低近代日本历史上的政党诞生及其后政党政治发展的意义，仅仅是想说明自由民权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早期日本政党及其制度，在当时与今天有着相隔百余年的不同时间点上，评价会迥然不同。

1889年2月11日，明治政府发布了钦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这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作为近代政党诞生温床的自由民权运动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可是在3天以后的2月15日，身为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在府县议长会议的演讲中却断言：“尽管党派在民间的存在这一结果已经形成不可停顿之势，但就此即可影响到政府是绝难想象的。……今后召开议会对照可问及公议舆论

的政事，有鉴于此，企望议会和政府即可根据政党加以组织内阁是最为危险至极之事。^①显示出当时把持权力的核心人物对待政党所持的轻慢与警戒心态。

而到了近百年后，另一位同样左右着日本政治发展的首相吉田茂在他著名的《激荡的百年史》中，则把政党政治产生及其潮流发展评价为：“以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代替开始走向穷途末路的明治国家体制。”并且特别强调：“政党政治的出现丧失了政治家之间的统一。由天皇和元老构成的最高领导阶层几乎完全消失了。继承他们的第二代领导者们，有的属于官僚，有的属于军部，有的属于经济界，有的是政党出身的人，他们不像第一代领导者那样，通过共同的经验和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一纽带结合在一起。”^②

那么，如何准确估价日本近代政党及其制度？怎样看待政党政治与资本主义近代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什么标尺度量作为历史遗产的早期政党对今天政治事务的潜在影响？这是我们认识、理解日本政党制度的基础和亟待研究的课题，问题的答案往往因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有所区别，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效果。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的是政党政治出现在日本，是极为重要的事件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诚如蔡斯奈德（E. E. Schattschneider）所言：“政党创造了近现代民主，而没有政党的存在，现代民主制度是无法想象的。”对于日本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政党政治同样是建立近代国家制度不可缺少的要素，特别是在结束封建专制、告别藩阀政治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确有其进步意义，如果借用列宁的话来评价，这就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外壳”。

渡边几治监修：《日本宪政基础史料》岩波书店 1939年版，第 472、481—482 页。

②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年版，第 32—33 页。

第二节 自由民权运动的政党政治催生作用

19世纪中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结束了封建幕府统治，全面引进、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大力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终于使日本成为亚洲惟一摆脱了欧美殖民统治进而跻身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国家。由于明治维新这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不彻底性，社会上大量残存的封建因素以及明治政府中守旧势力的阻挠，维新后的日本社会所走的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充满了坎坷，天皇制政府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与中小地主、工商业者以及一般民众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一 自由民权运动的五个阶段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全社会爆发了一场以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以及确立地方自治”为主要目的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史称“自由民权运动”。今天，日本的政治史家通常将自由民权运动从1874年酝酿、发动，进而逐渐走向群众请愿、集会的高潮，及至1889年后逐渐平息的15年时间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874—1878年的民权运动发动期。1874年1月14日，坂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由利公正、冈本健三郎、小室信夫、古泽滋等8人签名提出成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由此引发了关于建立民选议院的公开论战，并造就出“爱国公党”、“立志社”、“石阳社”、“爱国社”、“自助社”等一批民权组织，这些组织在坂垣退助等人的努力下朝着统一组建“爱国社大会”的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是1879—1881年建立“国会期成同盟”争取民定宪法阶段。据统计，截止到1881年，整个日本共涌现出600多个民权团体，各种爱国社团联合建立起“国会期成同盟”，以争取民定

宪法为目标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明治政府于 1881 年 10 月 21 日颁布了《开设国会敕谕》，宣布将于 1890 年开设国会。

第三阶段是 1881—1884 年的诞生资产阶级政党阶段。这一时期，早期的俱乐部性质的政治结社开始拥有了近代意义的政党雏形。同时，政府颁布《开设国会敕谕》缓和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早期资产阶级政党出现后，自由民权运动内部因而发生分裂。

此后，自由民权运动经历了 1884—1886 年激化与衰败的第四阶段和 1887—1889 年作为运动尾声的第五阶段，终于在政府的分化、瓦解下结束了。

二 自由民权运动结出的政治花蕾

自由民权运动虽然结束了，但运动直接导致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诞生，其进步意义与历史作用不容忽视。而作为资本主义近代化中政治发展的副产品，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近代资产阶级政党。老实说，早期的“爱国公党”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无论就其组织形式或是政治属性而言，“都属于群众性民权组织”，“爱国公党”从成立到解体的短暂经历也印证着 19 世纪 70 年代政治结社的不确定性，而且缺乏稳定与活力的民众结社也不足以担当起推进政治历史发展的职责。不过，这时的日本已经是山雨欲来，时代呼唤着形实兼备的政党出现，只有完整意义上的政党才能够推动产生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代议制度产生，才能够逐步形成近代日本所必需的国家体制。

1881 年 10 月 18 日，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党”成立，几个月后又出现了立宪改进党（1882 年 3 月）立宪帝政党（1882 年 3 月）。政党出现后，朝野间展开了关于“宪法与主权论战”，以自由党、改进党为一方，坚持主权在民，要求民定宪法；而帝政党方面则坚持主权在君，要求钦定宪法。明治政府一面重新修改《集会条例》，严格限制民众集会结社，用武力镇压自

由党发动的民众暴力运动，同时对自由党上层采取拉拢收买方针，让坂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出国旅游，引起自由党、改进党之间互相不信任，进而相互攻讦，导致原本就充满着妥协性的自由民权运动分裂。1884年10月，自由党领导层于大阪召开大会，宣布自由党解散。改进党也因为党首大隈重信（1838—1922）等主要领导脱党而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明治政府瓦解早期政党乃至平息自由民权运动的做法，可以说旧势力对新事物的抵制与扼杀只能取得暂时的效果，或曰赢得战术上的胜利而导致总体意义上的失败。因为，政党政治并没有因之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恰恰相反，倒是陈腐的贵族元老政治逐渐被政党政治所取代。不过，由于历史的局限和早期政党本身所具有的妥协性质，近代日本历史上的政党最终并未导致民主共和制度，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规范下，至高无上的天皇权威在后来相当长的岁月里君临在政党之上，及至军部法西斯政权时期，徒有虚名的政党政治实际上又被“大正翼赞会”所取代。

第三节 在皇权重负下沉浮的资产阶级政党

如前所述，尽管明治维新这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从形式上结束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但大量残存的封建因素和当时国际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弱肉强食的疯狂争霸，促使近代日本走上了一条天皇专制的军事帝国主义道路，在这种背景下政党虽然在缓慢成长，但却终于未能避免成为天皇神圣权威卵翼下的畸形儿的命运。

20 世纪前期的党人政治延伸

20 世纪的前 20 年，是党人政治同藩阀、贵族政治此消彼长的较量期。从 1904 年起，议院内部的议席已经主要由政党来分别占

据，政党地位也不断提高。不过，由藩阀、军人、贵族组织的内阁仍一再出现，每当护宪运动高涨，藩阀派就不断抬出天皇诏敕压迫政党内阁。

在大正时期（1911—1925），宪政与藩阀政治反复较量的结果是，政党政治以向军部妥协为代价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党演化而来的政友会取得了执政党地位，原敬内阁在执政期间提出了庞大的经济计划与财政预算，但同时陆海军扩军计划也迅猛发展。日俄战争以后，鼓吹积极政策的西原寺内阁，在追随军部上走得更远。不过，当时政党还保持着一定力量和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1924年以后，政友会和民政党开始轮流执掌政权，国家权力中枢转移到政党手里，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在形式走上了“宪政之常道”。

然而，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大危机时期，也给近代日本的政党政治造成深重的危机，两党在交替中不断做出经济政策调整，企图控制局面。后来，随着军部势力不断扩大，日本的政党制度被日本法西斯势力取代，及至1940年10月，第二次近卫内阁为推进“新体制运动”，强化管制国民的法西斯组织，搞起“大政翼赞会”，把所有政党强行纳入军国主义政权之下，日本政党政治历史终于被打断，整个国家沦为法西斯政党的一党专制状态。

二 早期政党政治的若干特点

军国主义势力攫取国家政治权力自然是国家封建军事帝国性质使然，但近代资产阶级政党本身的软弱与无产阶级政党力量相对弱小等等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早期政党从一开始就主动取悦天皇权威，政党本身存在着自我瓦解的内在因素。据石田雄在战后初期研究，即使是在“政党政治最辉煌的昭和初期（1925—1930），就已经存在对天皇体制表忠诚的竞争，当时政友会攻击民政党政纲中的‘议会中心主义’是反国体

的（1928）；反过来，民政党谴责犬养内阁未为樱田门事件（1932）引咎辞职是‘不尽臣节’。^① 有理由认为，近代历史上解散政党乃至政党制度的崩溃并不完全是军部单方面力量压迫的结果，事实上在 1940 年 10 月大正翼赞会成立之前，各个政党惟恐“搭不上新体制的班车的焦虑”，就争先恐后地自行解散了。^②

另外，关于早期政党政治的特点，武寅教授曾在《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中做过如下概括：“战前日本资产阶级政党在明治宪法体制的运行中，扮演着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即从宏观和微观政策角度，对体制的运行加以调节。政党的这种调节机能的产生，来源于其本身所固有的特点。”

“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是在封建制度已经瓦解，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已经站稳脚跟之后，它是体制运行中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在体制之外，作为体制的对立面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政党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其组织结构的松散性。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的源流除了以自由民权运动起家的所谓‘民党’之外，还有在开设国会前后出现的‘吏党’，他们以初期议会时无条件支持政府的立场而得名。但是‘民党’和‘吏党’的区别很快就不能再作为划分政党的标准。……不论在不同政党之间，还是在同一政党的不同派系之间，拥护天皇制的立场是共同的，而不同的只是形形色色的政策主张，以及关于这些政策主张实行的方式、时机、手段和可能性等等的争论。”

“日本的新体制政党同藩阀、官僚等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政治角色相比，虽然并不一定是从一开始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主角，但是它特有的政治潜力与政治作用却使它逐渐压倒藩阀官僚，并在国家政治体制的运行中发挥出无可替代的调节功能。在

石田雄：《近代日本政治结构的研究》，未来社 1956 年版，第 206 页。

② 白木正之：《日本政党史（昭和篇）》，中央公论社 1949 年版，第 305 页

宏观领域，它既是资产阶级立宪政治的产儿，又是这一政治的忠实守护神；在微观政策领域，它是形势变化的晴雨表和报警器，时时推动着政策的角度转换和目标定位。”^①

第四节 社会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政党兴衰

进入 20 世纪，无政府主义思潮兴起并进而发展为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主义思潮开始从思想萌芽发展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实践，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政党。

一 战斗中诞生的无产阶级政党

同许多亚洲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相同，日本共产党也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使日本无产阶级充满了革命的渴望，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则给东方的无产阶级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日本社会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与工农斗争相结合，日本国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由于明治维新使日本作为亚洲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方国家，并且沿着富国强兵的道路通过工业革命追赶西方列强，工业革命的后果之一是用大机械生产取代手工劳动的同时，造就了数以万计的产业工人。统计表明，1908 年仅仅在东京就业的工人已经超过 70 万，其中 65% 左右来自地方乡村；^② 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忙于战事使日本在国外市场竞争方面获得了优势，造船、钢铁、棉纺、缫丝、纺织等主要工业，以及电

武寅：《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1—186、200 页。

^② 中村隆英、伯纳德·格雷合著：《近代日本经济的发展》，外务省发行，1987 年版，第 37 页。

力、航运等基础产业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发展，随之产生了大批脱离了土地的城市无产者群体，也使日本产生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可能。

19世纪后期以来接连发生的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促使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19年3月，在产业密集的大阪出版了工人报纸《日本劳动新闻》月刊，4月堺利彦和山川均等人创刊《社会主义研究》，介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一年以后，《资本论》开始在日本陆续翻译出版。与此同时，片山潜在美国组建的日本人社会主义团体申请加入了共产国际。1920年底，日本建立起有3000多人加入的“社会主义同盟”，并在翌年5月举行第二届大会。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使政府紧张不已，1921年5月28日强令解散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但几乎同时，堺利彦、山川均、近藤荣藏等人就组成“日本共产党筹备委员会”，开始着手制定党的宣言和纪律、纲领。近藤还代表委员会应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局邀请专程到上海协商，为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积极准备。^①

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也从组织上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准备。仅在日共建党前三年（1919—1922）间就发生了川崎造船厂、足尾铜矿、八幡制铁所、东京炮兵工厂、大阪兵工厂、三菱造船厂等大规模工人罢工示威。其中八幡制铁所要求改善待遇的集会得到一万多名工人的支持，三菱造船厂的罢工活动参加者多达3800余人。1920年5月1日，日本1万多名工人第一次走上街头，在东京上野集会纪念国际劳动节。两周后，日本“劳动组合同盟”这一最早的工会的建立，表达了工人阶级产生了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强烈愿望。在此，经过工人运动的考验和锻炼，大批优秀分子涌现出来，为建党完成了干部队伍的准备。

^①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刊行《日本共产党的70年》，《党史年表》第58—59页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巨大影响，给日本共产党的诞生、发展以极大的推动作用。1921年11月，德田球一、高濂清等人出席了“远东各民族大会”的筹备会议。1922年1月，在莫斯科出席“远东劳动者大会”的日本代表们在片山潜、德田球一、高濂清的领导下，决定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原则，集中分散在日本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片山潜等社会主义者的不懈努力，片山潜在分析当时社会矛盾与政权结构的基础上，制定了建党纲领草案。明确提出：“废除天皇制。18岁以上男女均有选举权；工会、工人政党及其他工人组织结社完全自由；废除现行的军队、宪兵、警察及秘密警察制度；对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度和劳动保险制度，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没收天皇、大地主等的土地，把佃农从来以自己的农具耕作的土地全部分配给农民。经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1922年7月15日，东京涉谷召开了日本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党的章程，决定集体加入共产国际，会议还选举堺利彦为中央执行委员长。8月1日，山川均在《前卫》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的文章，10月创刊了半月刊《劳动新闻》。进入1923年，接连召开的临时党大会上讨论了包含“废除君主制度”22项条款的《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同年4月，中央决定将原有《社会主义研究》、《前卫》、《无产阶级》等三个分散的杂志合并为党的机关刊物《赤旗》，日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日本共产党诞生了。

二 无产阶级政党艰苦卓绝的斗争

无产阶级政党在日本迅速崛起引起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他们极力要将这颗红色的种子扼杀在萌芽中。1923年6月5日，内阁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对年轻的日本共产党进行公开镇压。拘捕了堺利彦、市川正一、上田茂树、德田球一、山本悬藏、渡边政之辅等80多人，其中29人被起诉。不久，政府又勒令《赤

旗》更名。面对白色恐怖，日本共产党内部一些不坚定分子发生了动摇，以山川均、堺利彦为代表的“合法主义”、“失败主义”、“取消派”一度向政府屈服，于 1924 年 3 月决定解散日本共产党。这一错误决定受到党内以德田球一为代表的坚定党员的抵制，出席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的片山潜、佐野学、近藤荣藏等人决定重建党的组织。1926 年 12 月，经过片山潜、渡边政之辅、德田球一等人英勇不屈的斗争，召开了日本共产党重建大会，并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把农民运动中的土地问题也提到工作日程上来。1928 年日本反动政府为镇压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发动“三一五大检举”，逮捕了近千名革命志士。

1931 年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东北以后，在国内加强了天皇制军事警察统治，巨大的压力使日共内部再次出现了主张以“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活动的声音。为此，1932 年 5 月，出席第三国际会议的片山潜制定了《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即《1932 年提纲》），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通过战争维持和强化天皇制的军事警察统治，即维持和强化他们对劳动人民实行的前所未有的专横暴力统治”，而“天皇制是国内反动的统治和一切封建残余的主要支柱”，是“剥削阶级的坚固的脊椎骨”，粉碎天皇制国家机器是“日本革命的首要任务”。

由此可见，尽管出现过许多波折，但日本共产党在战前始终坚持战斗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线。从党的政治属性上说，是一个按照列宁的理论创建的、以苏联布尔什维克为榜样，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政党。

第二章 战后政党制度的沿革过程

1945年8月15日，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打击下日本战败投降，由此揭开了战后历史新的一页。军部法西斯政权彻底崩溃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成为政党政治新的起点。

第一节 战后政党政治的再生与重构

军部法西斯政权败亡后，美国占领军以盟军名义统治着日本，战争时期在日本疯狂对外侵略扩张的背景下形成的军部法西斯主义一党制随之解体。这一转变迎来了政党勃兴的高潮。战后最初的十年中，日本政治上经历了由“群党乱立”走向“保革对立”的过渡阶段。

一 解除党禁后的“群党乱立”局面

1945年10月4日，美国占领当局发布了《废除对政治、民权及信仰自由的限制》（即著名的“人权指令”）的指令，强令废止战争时期实行“战时总动员体制”下的各种法令，尤其是臭名昭著的《维持治安法》，告诫日本政府废除对政治、民权与宗教信仰的限制。同年11月3日，美国政府又以国务院陆海军部协同委员会的名义向盟军总司令部发出《美国战后对日本第一号文书》，指示盟军总部“为了建设日本与世界和平，必须镇压鼓吹军国主义、侵略主义的宗教团体，并指导日本确立尊重信仰自由和各种基本人权”。

党禁一开，日本被军国主义法西斯政权压制多年的政治热情迸发出来。1945年11月2日，处于左翼立场的日本社会党成立。一周以后，站在保守政治立场上的日本自由党宣告成立。随后，进步党、共产党、革新党、劳动大众党、青年自由党、国民党、生活党等33个较大政党成立或恢复活动。至1946年初，日本政治舞台上已经出现了多党竞争的纷繁局面，小型政党多如牛毛。据中村菊男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中的记载，盟军总部下达“人权指令”后，社会上迅速崛起了多达300个以上的大小政党，舆论惊呼战后日本社会中出现了“群党乱立”的局面。不过，战后初期政党蜂起局面并没有维持很久。一方面，作为后来保守政党源头的日本自由民主党、进步党在盟军总部的整肃下分化重组。另一方面，战前受到迫害摧残的共产党重新树起旗帜，把部分进步势力聚集到一起，使渴望和平、民主的中下层民众分别置于自己的政治团体当中。至于鱼龙混杂的“泡沫政党”更是在热闹一时之后，便草草退出了政党政治舞台。

这一时期政党变化的特征，是盟军总部的统治策略直接左右着政党地位与政党势力的消长变化。盟军占领总部最初的政策是着力抑制战前遗留下来的保守政党。战争结束后，曾经在战前政治舞台上行走的政客们“物以类聚”地重新组合到一起，组建起大小不等的保守政党。其中规模最大的要属进步党。该党大部分成员来自战前的“大日本政治会”，被人讥讽为“汇集了历史上所有有劣迹的人物的政党”。盟军总部开始整肃后，进步党274名议员大部分被作为对象褫夺公职，该党在国会中的议席仅剩14席。

二 革新政党的复兴与发展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结束了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的残酷统治后，美国占领军指令释放大约3000名政治犯。1945年10月10日，被关押18年之久的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与其他15名战